

目录

contents



两种传统(代序)/1

复旦园里长镜头

——记陈望道先生/1

与古人交友的人

——记郭绍虞先生/7

刘翁得马,焉知非祸

——记刘大杰先生/12

终于讲席的教师

——记朱东润先生/17

岂好辩哉,不得已也

——记陈子展先生/22

不肯跟风的独行者

——记蒋天枢先生/27

复旦奇人

——记赵宋庆先生/31

应世尚需演戏才

——记赵景深先生/35

藏书家的悲哀

——记王欣夫先生/41

学府悬壶

——记吴剑岚先生/44

踏着革命的节拍

——记吴文祺先生/49

莲花落里探真情

——记张世禄先生/55

信徒的天路历程

——记乐嗣炳先生/61

把“人”字写得端正

——记贾植芳先生/80

复旦的新月

——记余上沅和方令孺先生/86

月亮上的顽石

——记孙大雨先生/92

早起的虫儿

——记王中先生/98

他走得不是时候

——记吴斐丹先生/104

纵横放谈启人思

——记鲍正鹄先生/110

不胜负荷双肩挑

——记胡裕树先生/118

美的探寻者

——记蒋孔阳先生/126

自由翻译家的不自由

——记毕修勺先生/133

洋博士的草根情结

——记朱洗先生/140

为学不作媚时语

——记王元化先生/149

拍案一怒为胜迹

——记陈从周先生/160

散淡襟怀荆棘路

——记钱谷融先生/166

自我的疏离与回归

——记王道乾先生/172

市嚣声中听雅乐

——记辛丰年先生/178

焦桐琴传清越声

——记刘衍文先生/183

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

——记章培恒兄/189

北邙山上一片叶

——记叶鹏兄/208

集体项目磨半生

——记顾易生兄/216

命运的纤夫

——记施昌东兄/223

坎坷的人生道路

——记戴厚英女士/229

附录一

办学理念与学术精神

——从鲁迅在北大当讲师说起/246

顾影看身不自惭

——周作人的晚年心态/251

从表现论到喇叭论

——郭沫若文艺观的变迁/260

一个美学家的文学谈

——朱光潜的美学历程/269

文人的误区

——吴晗的悲剧/279

附录二

偶与风云值，独存豪气多（骆玉明）

——记吴中杰先生/284

后 记/288

增订本跋/291

两种传统(代序)



北京大学定于 1911 年 5 月 4 日来举行“百年北大”的庆典，是很耐人寻味的事。因为这个数字包含着一种二重组合：一百年前的 1911 年，是清末京师大学堂开办的年份；而“五四”则是作为其后 1919 年左右所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学生运动的标志，北大是这运动的中坚力量。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在机构上虽然有承续的关系，而在精神上，却是完全相反的。如果没有蔡元培校长大力改革京师大学堂留下来的陋习，开创北大新学风，那么，它就绝不可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和爱国学生运动的先锋。这样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：我们今天所要继承和发扬的，是京师大学堂的廊庙传统呢，还是蔡元培改革后的民主传统？——因为实际上北大是存在着两种传统的。

看“百年北大”的有些纪念文章，觉得对这两种传统区别性的认识很模糊，甚至还有意回避蔡元培的办学思想。其实，在过去，革命者对此的认识是很清楚的。1956 年蔡元培逝世时，毛泽东在唁电中称他为“学界泰斗，人世楷模”，可见对蔡元培评价之高；1956 年 5 月 4 日，重庆《新华日报》发表社论《怀念蔡元培先生》，一开头就说：“北大，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、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，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。然而，北大之使人怀念，是和蔡子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。”也可见当时革命者对北大精神的明确理

编员

两
种
传
统

解。不知后来何以却逐渐地变得含混了起来。

诚然,京师大学堂的开办也是值得纪念的,因为它毕竟是晚清维新变革的产物,是我国新式大学的开始。但是,这所学堂并没有学得西方大学以学术为本位的办学精神,却承袭了我国科举制度的余绪,成为学子步入官场的阶梯。京师大学堂之官气重于学气是必然的,因为在封建社会的中国,根本就没有独立的知识阶层,除了少数的隐逸文人之外,绝大多数学子的目标都在于廊庙,——有些人甚至把归隐也当作做官的终南捷径。既然志在做官发财,学问自然是不必讲究的了,只要混个资格,找个好后台即可。京师大学堂的腐败,其源盖出于此。到了1911年底,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时,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这时,不但清王朝已被推翻,企图恢复帝制的袁世凯也已垮台,民主的力量大大地加强了。同时,由于多年来商品经济的发展,中国的资本势力虽然还不够强大,但也可以为知识阶层摆脱对于廊庙的依附,进行独立的活动,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。蔡元培本来就是民主革命斗士,又在德国留过学,并到法国考察过教育,对西方教育体制深有了解,所以他可以凭借北大这个舞台,来导演一出有声有色的教育改革活剧。

蔡元培在就职演说里,就要学生打破做官发财念头,而明确入学宗旨:“大学者,研究高深学问者也。”为了活跃学术空气,发展教育事业,他十分强调学术独立,思想自由,甚至对教师在校外发表的各种政见也不过问,对他们的私德也不苛求。面对社会指责,他理直气壮地公布了自己办学的两项主张:一是“对于学说,仿世界各大学通例,循‘思想自由’原则,取兼容并包主义”;“无论为何种学派,苟其言之成理,持之有故,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,虽彼此相反,而悉听其自由发展”。二是“对于教员,以学诣为主。在校讲授,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。其在校外之言

动,悉听自由,本校从不过问,亦不代负责任”。(《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》)蔡元培所说,决非虚言,接着他就举出许多实例来:“例如复辟主义,民国所排斥也,本校教员中,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,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,与政治无涉,则听之。筹安会之发起人,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,本校教员中有其人,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,与政治无涉,则听之。嫖、赌、娶妾等事,本校进德会所戒也,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,以纳妾、狎妓为韵事,以赌为消遣者,苟其功课不荒,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,则姑听之。夫人才至为难得,若求全责备,则学校殆难成立。”这里,“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”指的是辜鸿铭;“筹安会之发起人”是刘师培;纳妾、狎妓者虽很难确证有多少人,但陈独秀逛八大胡同是公开的秘密,辜鸿铭不但纳妾,而且还有一套宣传应该纳妾的理论,他说:男子纳妾是天经地义,只有一个茶壶配四只茶杯,没有见过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。而且蔡元培也的确鼓励师生在学术上发表不同的意见,甚至反对到自己头上来也并不介意。比如,胡适提倡“新红学”,提出自叙传说,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,同时必须否定旧红学的种种理论和方法,其中之一就是蔡元培的“政治小说”说和索引派方法。蔡元培未必同意胡适的新说,但却欢迎他的标新立异。正因为蔡元培实行了上述两项主张,所以当时北大人才济济,极一时之盛,学术空气空前活跃,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。

其实,学术独立、思想自由的原则,在中国,并非蔡元培一个人的主张,我们只要看看自称“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,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”的陈寅恪,在为王国维所写的纪念碑铭中,称颂他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,是“历千万祀,与天壤而同久,共三光而永光”,就可以想见这种思想原则,实际上已成为具有现代思想的学人们的共识。

既然高等学府能够以学术为主体,知识分子自然就可以摆脱对于廊庙的依附,靠自己的知识谋生。而只有摆脱依附状态,发扬独立精神、自由思想,才能改变以往专做注经家的生存状况,而进行对于真理的探求。正是由于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响,又有北京大学教授们的带头,在中国,造就了一代自由知识分子,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,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

现代知识分子并非三家村的冬烘先生,他们具有强烈的使命感。北大的教授们对于社会问题大抵都很关心,而且总有自己的看法,虽然他们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大不相同。且不说在文化问题上,新旧两派形同水火,就是新文化阵营内部也很快地分化,但是,无论哪一派,都想保持独立精神,对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作出自己的评论。鲁迅、周作人、钱玄同、刘半农等人组成的《语丝》周刊,是他们自己凑钱出版的刊物,目的在于自由地发表一点“独立判断”,这个刊物在女师大学潮中和“三一八”惨案后,起了很大的主持正义的作用,而以胡适为代表的另一派,虽然与权力者比较接近,但也不想走入廊庙,处于依附地位,他们把自己的一个刊物取名为《独立评论》,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

正是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评论,大大地活跃了中国人的思想,使之走出了万马齐喑的局面。但是,政治力量想通过权力来控制学校、控制知识分子的做法,却也从来没有停止过。从段祺瑞的“整顿学风”、张作霖的捕杀学人,到国民党“悦系”对于大学的渗透与控制,走的都是这一条路子。但这种种措施,只有使大学遭殃、文人受难,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起破坏作用。正如蔡元培所说:“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。在中古时代,大学教科受教会干涉,教员不得以违禁书籍授学生。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,既被公认,能完全实现之者,厥惟大学。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,不

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 ,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。苟其确有所见 ,而言之成理 ,则虽在一校中 ,两相反对之学说 ,不妨同时并行 ,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 ,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。”(《大学教育》)据蔡元培在欧洲考察所见 ,即使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的德国 ,其大学在学术上也是独立的 ,这就是欧洲文化教育事业能够快步发展的原因。所以他大力提倡学术独立、思想自由 ,实在是为了促使中国教育的现代化 ,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。

1919年 缘月

缘播

两
种
传
统

复旦园里长镜头

——记陈望道先生

陈望道先生年轻时,是一个敢说敢干,很有个性的人物。他的外号叫“红头火柴”,是谓一擦即燃之意。这只要看他当年在浙江第一师范教书时,积极支持学生运动,敢于与封建教育当局斗争,因而被列为“四大金刚”之一;后来,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中,因不愿受陈独秀的家长式统治和背后的造谣污蔑,终于与他闹翻,拂袖



而去,即可见出他刚烈的性格来。但当建国后出任复旦大学校长时,他已是一个老成持重、表情严肃的长者了,人们尊称他为“望老”。再加上传媒着意宣扬他的原则性、组织性,而抹杀他的个性表现,把他塑造成一个听话的好老头形象,就有点令人望而生畏了。

其实,即使到了晚年,望道先生仍旧保持着他的个性,仍旧具有独立精神,不肯随波逐流,不肯曲从于强势话语,更不肯迎合上

播音

复
旦
园
里
长
镜
头

意来误导群众,始终保持着一个学人的良知。只是,年岁已经过去了他“红头火柴”的烈性,环境也不允许他再作金刚怒目状了。但在某些场合,还能听到他的异调奏鸣,在很多时候,还能感受到他的人情温暖。只是,传媒不肯如实报道而已。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,上面提倡一边倒,全面学习苏联,文教领域也是唯苏联专家的意见是从。在一次科学院学部委员会议上,王力大谈苏联专家如何说,如何做,望老听得实在不耐烦了,就顶了一句,说:“王力先生,这里是我们中国!”顶得王力无话可说。在制订汉语拉丁化字母时,苏联专家提出要加进一些斯拉夫语的字母,中国专家心里不同意,但慑于政治压力,没有人敢顶苏联专家,只有陈望道出来反对,说斯拉夫语字母与拉丁字母体系不同,加进来不伦不类。他与苏联专家辩论了一个上午,连中饭也没有吃,终于将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意见顶住了。

在复旦,他这种异见就表现得更多了。有一次,学校召开批判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大会,要望老出席,在批判会行将结束时,照例要望老讲几句话,以示尊重。一般说来,在这种场合下发言,总要顺着大会的主导方向,说几句凑趣的话,至少,总要对大会加以肯定,对发言者加以鼓励。但望老却不然,他唱的几乎是反调。他说:“学术著作应是材料与观点的结合,观点经过讨论可以提高,但如果有大量可靠的材料作基础,那么这部著作是批不倒的。只有那种空头理论,一批就倒。”接着,他却批评起那些发言者来了:“你们今天的发言,为什么都是念讲稿?讲话应该发挥自己的意见才是。”弄得主持者很是尴尬。但校报发表会议消息时,只报道陈望道校长出席了批判会并讲了话,对他的讲话内容,则一字不提。这就是所谓新闻导向吧!

力抗衡时代潮流,但实在看不过去的时候,他还是要讲。直言无效,则以幽默之语出之。在某一场合,大家谈到全国普遍存在的重理轻文倾向,都很有意见,而作为语文专家的望老,却突发奇论道:“别人都说现在是重理轻文,我看倒是重文轻理。你们看,现在报刊上文章很多,但是说理很少,这不是重文轻理吗?”望老说得一本正经,听者为之绝倒。闻此言说,我乃悟到,望老为什么要把他主持的专门研究语法、修辞的研究室,再加上逻辑二字,定名为“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”,盖因逻辑观念、理性思维实在是非常重要的,非要着重研究、加以推广不可。

大跃进时期,复旦掀起了集体编写教材的热潮。此热潮席卷文科,无人敢于抗拒。因为在当时,对此事的态度,就是衡量你对“三面红旗”(指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)的态度,乃一重大政治问题,弄不好,是可以被打倒的。但望老并不紧跟,仍旧保持自己的见解。他对身边的人说:“这种东西,剪刀加糨糊,一个星期就可以编出一本来,没有什么意思。”所以,那时他不参加什么集体项目,后来也不肯主编这类东西。他一向认为,做学问应该踏踏实实,不能贪多求速。他不喜欢“著作等身”之类的话,认为这样毫无意思。据他的老学生倪海曙说,他常常用“驼子下棺材”这句歇后语来形容认识的发展过程,意谓一头着实地,一头又翘起来。因此,研究学问要“若存若忘”,长期坚持,不断探索,不断验证,才能有所成就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前,学生会曾请望老题字,当时有许多政治口号,极为红火,学生会干部希望他能写上一句,但他不肯,只题了“又红又专”四个字,因为对这个口号,他是赞成的。但这幅字,大概不被重视的缘故,早不知被人丢到何处去了,他儿子想去找回,也没有找到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,全国大搞“批儒评法”运动,简直把法家捧到天上去了。而有些学者,为了紧跟形势,为了救出自己,或者还想附势而上,也就迎合上意,或则以儒法斗争为纲来修改自己的旧作,或则改变自己一向尊儒的观点,为法家大唱赞歌。但望道先生则保持沉默,不肯附和,而且私下里还对他的研究生说:“法家杀气太重。……”虽然欲说还休,但忧虑之情可掬。那时,上海一家出版社奉命要重印望老的《修辞学发凡》,但认为书中所用儒家的例句太多,要他修改。望老不肯改,经一再动员,也只改换了几个例句。出版社领导说:“这个样子出版出去,不符合批儒评法的精神,怕外国人看了要挑剔。”望老对他的助手说:“我倒不怕外国人挑剔,而是怕有些中国人挑剔。”

望道先生不但在平和中保持了个性,而且在严肃中充满着感情。贾植芳先生就常常念叨望道先生当年对他的关心,那当然是在1955年他因胡风案被捕之前的事了。有一天,望老夫人蔡葵先生对贾先生说:“我们陈先生说,你贾先生手面大,这点工资怕不够开销,我们两人的工资花不完,请你帮我们花一些。”他们每月送给贾先生100元,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贾先生说:“他如果说是资助,我是不会接受的。他叫我帮着他花钱,我当然只好收下了。”这可见望道先生如何善于体贴人心,而且也很富于幽默感。其实,这种请人“帮助花钱”的事,是望道先生的老习惯了。1950—1956年代,他就经常拿自己的工资来支援穷学生,也并不声张,有时蔡先生发现他拿回来的工资太少了,问起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望道先生对朋友的情义,在乐嗣炳先生身上表现得更加充分。他们二人是1934年代提倡大众语运动的老战友,当年为了反对复古思潮,为了中国语文的新生,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,甚至

被人扣上红帽子。可是,乐先生命途多舛,一生颠沛流离,1954年
年代初在广西柳州军分区当联络员,做争取土匪的工作,但不知怎
样一来,却被当作通匪的嫌疑分子关了起来。审查了三年,却一直
没有结果,后来在老朋友司法部长史良的关心下放了出来,也不
做正式结论。其时,望道先生身兼华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、华
东文化局局长等许多职务,处于高位,但他并没有“一阔脸就变”,
当乐先生于1956年愿月份一回到上海,望道先生就介绍这位落魄
的老朋友进复旦中文系做语言学教授。不料到得1957年,乐先
生又被打成右派分子。望道先生还是非常关心他,在乐先生摘去
右派帽子的当晚,望老偕同夫人,登门拜访。此后,二人仍经常来
往。这在当时,是非常难得的。

望道先生当校长时,正是校长缺乏权力之时。但是,他还是
要利用手中不多的权力,来为师生员工做点好事。他常说学生能
来复旦读书不容易,轻易不要处分。每当有学生犯事,——多半
是思想上的事,公安局要来抓人时,望老总说慢点批,他要了解一
下情况再说。因为公安局一抓,这个学生就要除名,这一辈子也
就完了。所以凡是能保的,望老总要保一下。

望道先生自己掏钱买树,绿化校园,以及尊重工友,帮助工友
等事,在复旦时有所闻。而最令人感动的是,他在临终时,还在关
心复旦师生员工的生活,为复旦划归市区之事而操心。盖因复旦
地处城乡结合部,划归市区或者划归郊区,处于两可之间,1956年
代复旦原属杨浦区,属于市区,恰恰到了三年困难时期,却被划到
宝山县去了,属于郊区,当时物资供应市区与郊区是大不一样的,
——肉票、油票等,郊区都少于市区,点心票也没有,这在每一
两粮票都算着用的时候,就使复旦师生员工吃亏不少。从那时
起,望道先生就不断地向市领导提出请求,要把复旦划为市区,但

一直没有解决。在他病重时,他告诉家人,凡是市里领导人来看望,都要提醒他再提此事。市领导问他最后有什么要求,他说,我个人别无所求,但希望一定要为复旦解决划市区的问题。在他一再要求之下,总算将此事解决了。

在这里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争取一项具体待遇的问题,而是一个校长的责任心,——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私利,而是全校师生员工的利益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还没有下台就骂声不绝,有些人一下台就无人理睬,而望道先生逝世几十年了,老复旦们还深深地怀念着他的原因了。

遥远

海
上
学
人

与古人交友的人

——记郭绍虞先生

郭绍虞先生是复旦中文系唯一的一级教授，——当然，陈望道先生也是一级教授，但是，他做了校长之后，就离系而去，不再教书了。所以，实际在系里教书的一级教授，就只有郭绍虞先生。

但是，这位一级教授却不是科班出身。他不但没有上过大学，就连中等学校也没有毕业，只在土木工程学校读过

一年书，相当于初中一年级水平，就去做小学教师了。但他十分努力，自修文史，以扎实的论文引起学术界的注意，终于走上了大学讲台，可以算是自学成才的典型。当时胡适就很赏识他，推荐他到协和大学教书，协和大学校长一看他的学历，很不放心，特地派了一位教授去对他进行考核。倾谈之下，那位教授认为他很有



摇苑

与
古
人
交
友
的
人

学问,复命之后,校长就聘郭先生为文学院院长。从此郭先生就成为有名望的教授,后来还做过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、同济大学文学院院长。1959年怨月,他从同济调到复旦,做了复旦中文系主任。

郭先生年轻时大概颇为活跃,他写过体育史著作,从事过新文学运动,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。据说,文学研究会在北京酝酿时,本没有沈雁冰和叶圣陶,还是郭绍虞先生提名介绍的。郭先生与叶圣陶是小学同学,关系一直很好,与沈雁冰也是老朋友。

但是,在我见到郭先生时,他已经是一位 70 多岁的长者了,动作迟缓,讲话慢条斯理,带着一口浓重的苏州腔。大家都尊称他为郭老,——高班同学有时叫他“郭老板”,那是为了要他多拿些钱出来开迎新会之类。当时高校教师收入较高,而且师生关系也较为融洽,每有迎新会联欢会之类,学生会干部就到各位老师那里募钱,教师们都会认捐一些,郭老是系主任,工资又最高,每次出的钱也最多。但 1959 年之后,师生渐渐隔阂,再也没有这类事情了。

郭老住在复旦庐山村时,客厅里挂着一幅水墨立轴,画着郭老的全身像,长袍布鞋,手持书卷,面带笑意,一副敦厚的样子,非常传神。

我们读书时,郭老身体很不好,血压高,有时还到了危险的境地。但他仍很用功,努力接受新理论,修改他的旧著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,1959 年就出版了修改本。复旦地处郊野,夏夜多蚊,那时设备又不好,听说郭老是穿着高筒胶鞋来工作的,这种精神,着实令我辈后生小子感动。后来搬到南京西路住,条件好些了,郭老年事虽高,但始终笔耕不辍。据他助手说,郭老每天起得很早,梳洗后即进书房工作,午饭后,略事小憩,再工作到傍晚。因为年老,晚上才不工作。也不大有什么娱乐活动,只偶尔听听评弹,这是苏州人的普遍爱好。因为郭师母张方行女士非常能干,而且对